

红军由弱变强的关键因素

□ 李晓巧

我的父亲刘子云（1914—1992年）开国少将，江西永新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担任第四十七军参谋长兼湘西军区参谋长。1951年，父亲奉命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简称军事学院）报到，受刘伯承院长委派，负责军事学院基本系阅兵学员的训练工作。从1952年至1956年，父亲连续5年组织训练工作，我有幸见证了训练过程。

受命组织训练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父亲刘子云奉命从湘西剿匪斗争的第一线来到南京，向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报到。刘院长委任他兼训练处长，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到学院的第二天，父亲就开始搞教学法训练，一连搞了4天。训练抓得很紧，早上5点起床，晚上10点后才休息。

没过多久，刘院长和陈伯钧教育长把我父亲找去，要他把学校的政治、训练等工作都兼起来。他一听马上说：“院长啊，我干不了呀！”刘院长马上说：“能行，我还可以帮你忙嘛！”此后，无论是制订计划，还是写总结及训练情况汇报，都是我父亲先写好，再请陈伯钧修改，改完后再送刘院长审阅。刘院长看得很仔细，边看边问他，直到一点一点都核实准确后才放心。

刘院长改稿时，总是那样认真，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改，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改完后他要求我父亲重新抄写，并复印几份，分别送给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院党委各一份，还指示他和教育部教员、顾问多联系，多了解一些情况。每逢开会，刘院长总是强调，要开门见山，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

针见血地揭示出军阀军队与红军的本质区别，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

没有政治训练，没有政治教育，就没有真正的红军。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党中央的《井冈山斗争》报告中特别提出，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承担革命斗争的常识，斗争再艰苦也不出怨言，同时也强调，因党的支部建在连上，负责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的党代表以及党代表制度不能废除，并且他还请求中央和省委派同志来充实党代表队伍，加强对红军的政治训练。

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深入分析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设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人民的军队，并针对当时红军中忙于打仗而政治教育缺乏的问题，明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大会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党内教育问题”，从意义、材料、方法上对在红军中开展干部、党员教育进行了系统阐述、部署，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体系也相当完善。

在开展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上，结合当时实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如：识字同志阅读党报、政治简报，组织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开展政治教育训练班，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对不识字党员，读书报给他听，个别谈话，开展批评会、政治讨论会等等，同时也把党的小组会、支部大会和支部委、组联席会这“三会”作为党内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

古田会议决议中还着重提出了“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将经过充分政治教育培养的党员充实到红军战斗部队的各个层面、岗位，这也是“党指挥枪”的一个贯彻落实。

党充分考虑到对红军中青年党员的政治教育，从组织架构上进行了设置。为计划对青年党员的教育，计划争取青年工农群众的方法，并指导青年工作会议，前委及纵委里各设立五人之青年工作委员会，支队委及支委则各设一个青年委员。

对红军中非党员骨干的政治教育也毫不放松，以“活动分子会议”“联席会议”的形式进行常态化教育。注重加强对红军普通士兵的政治训练。

决议要求“很艺术地编制课本，作对士兵的训练材料”，是指要把政治分析及红军的任务与计划、三条纪律建设的理由、怎样做群众工作、革命故事、革命歌曲、识字运动等19个项目“很艺术”地结合实际，编辑成红军士兵喜闻乐见、容易理解接受的政治训练材料形式，以达到实际效果。士兵的训练方法有上政治课、早晚点名说话、集合讲话、个别谈话、游艺、改良待遇等，可谓详尽周到。

古田会议之后，政治建军的原则已经确立。1930年1月，针对之前“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以及红军中出现的怀疑和悲观情绪，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通信，不仅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的问题，而且找到了中国革命在城市中被强大敌人所击败，无法以城市为中心取得全国性胜利的规律，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

为了充分教育红四军全体党员和全军干部，毛泽东决定把这封通信以公开形式印发全军学习，对全军进行政治教育，这对其后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保障作用，从思想上解开了当时红军中出现的一些“心结”，也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理论至此基本形成。

政治教育对改造起义部队也发挥了巨大作用。1931年12月24日，发生了著名的宁都兵暴，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多人举行了起义，随即被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但由于这支部队是由上级将领组织兵变起义的，大部分起义官兵在奔往苏区的路上还不知实情，他们不了解起义的意义，不了解苏区的情况。当时部队的情况很复杂，军心不稳。紧急关头，红军军委下令，要以红军的精神来教育改造这支部队，毛泽东亲自部署，指示被派往红五军团做政治委员的肖劲光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全面加强起义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尽管改造红五军团困难重重，险情迭出，但经过两个多月的集中整编、改造和政治思想教育，红五军团成长为一支新型的可以信赖的人民军队，成为一支为革命作出巨大功勋的红色劲旅。

综合党史来看，红军时期形成的政治教育、政治学习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其初创时期，还是在瑞金时期、长征路上、延安边区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一直在党的历史上闪烁着灿烂光芒，是人民军队由弱变强的关键因素之一。

（摘自2017年第24期《群众》）

中共第一部关于政治纪律的专门法规

□ 李自强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我国进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中央纪委怎样开展工作？陈云明确指出：“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今后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协助中央和各级党委切实抓紧抓好党风的整顿。”

抓党风，就要抓好纪律的执行。在陈云的主持下，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政治纪律的专门法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式出台。

为使《准则》这一党内法规真正发挥作用，陈云多次强调遵

守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的极端重要性。1982年9月6日，他在党的十二大上发言强调，在考察提拔干部方面“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

在遵守政治纪律这一点上，邓小平也有着相同的看法。他多次要求：“各级党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规定，一切行动服从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这一点在现在特别重要。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把这一点作为当前的重点。”

根据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央纪委始终把严肃政治纪律放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多次在全会中予以强调；同时，又十分重视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坚决纠正一些组织、一些党员在党的纪律上的涣散状态。

（摘自2018年7月10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原标题为《“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



聂荣臻的《树叶训令》

□ 吴小龙

1942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司令员曾签发过一道独特的《树叶训令》，命令全区所有部队，将村庄周围15里以内的树叶，全部让给老百姓，部队到远离村庄的无人区采摘树叶充饥。

1942年春，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日军为了把华北变为其发动“大东亚圣战”的供给基地，自1941年秋季开始，先后出动7万兵力，对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扫荡”。不幸的是，当时又发生了旱灾，致使冀中平原和整个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赤地千里，边区军民收成锐减，不仅老百姓没有粮吃，军队自己的给养也成问题。为了度过春荒，我军战士们每天出去采树叶，“一棵大树上的树叶够一个排的人吃上一天”。

当时，唐县和家庄村老百姓有900多人，部队200多人，加起

来1000多人，老百姓和驻军都以采树叶为食。聂荣臻司令员得到消息后，为了不影响军民关系，便下了禁止部队采摘村庄附近树叶的训令。后来聂荣臻曾在回忆录里对此记述道：“1942年春天，青黄不接，群众和部队都发生了粮荒，入春后，老百姓就把树叶当成了主要粮食。我们部队有的伙食单位，请示能不能采集树叶，我曾要求军区政治部为此发了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要把它留给群众吃。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据八路军老战士赵福展回忆，1942年他在唐县和家庄村参军，那时八路军一天只吃两顿饭，每顿饭是三个二三两重的树叶饼，吃不饱就多喝点野菜汤。另据八路军老战士田顺心回忆，当年部队每天不仅要跑十几里的山路去摘树叶，而且山上的野果还不能摘，也留给老百姓。

这个关于“禁止采摘树叶”

的训令以布告的形式贴到了村庄周围。布告贴出后，村民发现和我们一起摘树叶子的八路军指战员不见了，很是感动。老百姓纷纷表示，八路军是我们的子弟兵，大家应该一起共渡难关。更有一些群众找到军区和边区政府，见到了聂荣臻，恳切地希望他收回训令。军区和边区政府亲切接待了来访群众，但训令不仅没有被收回，而且还传达到了晋察冀军区的其他部队贯彻落实。

为了共渡难关，晋察冀军区的机关、部队在严格执行训令的同时，制定了节约粮食计划，所有脱产人员除伤病员外每人每天要节约一至二两粮食。仅1942年，各部队就节约出14万斤粮食，这批节省下来的粮食用于救济受灾的老百姓。机关和部队还迅速动员起来，投入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军民团结一心，终于度过了这段最困难的时期。

（摘自2019年12月12日《人民政协报》）

父亲刘子云与国庆阅兵

□ 刘南征

着学员叔叔操正步，像模像样，逗得叔叔们哈哈大笑，大家纷纷说：这小家伙学得还挺像！

我们在天坛公园住了近一个月，直到距离开学的日子近了，我们才回南京。这个暑假让我终生难忘。

大阅兵的排头兵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先后在北京和各大军区所在地分别举行了授衔授勋典礼。正在北京带领军事学院阅兵方队训练的父親有幸参加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的授衔授勋典礼。9月27日，我父亲走进中南海里转悠，除了跑到祈年殿、圜丘、回音壁玩耍外，更主要的“任务”就是和学员叔叔们一起起床，他们操练，我们做忠实观众，坐在旁边认真观看，场场不落。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和我们一起玩，只有我们姐弟三人，学员叔叔休息时，也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尤其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我，帮助炊事员叔叔择菜；跟在炊事班叔叔后面送绿豆汤、送凉开水、送饭。那时，我每天都跟着炊事班的叔叔满公园转悠，坐在三轮车上很得意，觉得自己就像个“小小兵”，非常神气，特别骄傲。

七八月间，北京天气炎热。我们姐弟三人看到学员叔叔汗流浹背，衣服上一层层的盐渍，感到很好奇。他们休息时，我们一边给他们送去大蒲扇，一边指着盐渍问这是什么。不到6岁的弟弟穿着背带裤、撅着小屁股学

献，我父亲刘子云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他的一级解放勋章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当场颁发的，其他两枚二级勋章则是在1955年10月回到南京后由陈毅元帅颁发的。授衔典礼后，周恩来总理宣布：今年国庆典礼之日，毛泽东主席将在天安门城楼阅兵，检阅三军将士。

1955年10月1日国庆6周年阅兵，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七次国庆阅兵，首都50多万人参加了国庆典礼。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应邀参加国庆典礼的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0多位外宾参加了检阅。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乘车检阅了受阅部队，并向全军发布了命令。杨成武任阅兵总指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官兵身着新式军服接受检阅。这次国庆阅兵，展示了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后的崭新风貌。阅兵第一次出现了将军将领。

1955年10月1日国庆节，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开始前，我们都围在收音机旁边，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天安门现场直播。

听着广播，我们仿佛来到了北京天安门前（当时我们在南京）。首都天安门广场格外庄严。天安门城楼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红墙两端高大的建筑物上写着“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世界和平万岁”等庆祝国庆的标语。

毛泽东主席同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在阅兵前来到天安门检阅台上，广场响起了暴风雨

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上午10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首都人民庆祝国庆6周年大会开始。军乐团奏起国歌，礼炮齐鸣。

阅兵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乘阅兵车从天安门出发，由阅兵总指挥杨成武上将陪同，检阅陆、海、空军各部队，并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

10时25分，分列式开始。阅兵总指挥杨成武上将乘指挥车沿长安街自东向西驶过天安门。

在指挥车后面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队伍，随着《义勇军进行曲》，身着深蓝色礼服的军官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天安门广场。此刻，我们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激动的声音：“刘子云将军身着新式军礼服，佩戴金灿灿的少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引领着八一军旗和军事学院方队，以崭新的军容，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由于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后的首次亮相，作为受阅排头兵的父亲受到中外新闻记者的关注。父亲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内外来宾的注视下，向着宽阔的长安街迈出了第一步，引导着八一军旗和各个方队通过天安门。父亲不负重托，带领军事学院方队出色地完成了国庆阅兵任务。

1956年1月，军事学院成立5周年时，刘伯承院长兼政委发布命令，对优秀教学单位和教员、学员予以表彰，我父亲荣获军事学院一等奖。不久，毛泽东主席在刘伯承院长的陪同下到军事学院视察，我父亲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并和毛主席握手留影，这张照片成了我们家最珍贵的记忆。

（摘自2019年第12期《百年潮》）

